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孙方兰 李余华

(社会科学部)

摘 要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构想中,渗透于每一具体“构想”中的,就是他的哲学思想.文章从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全面运筹的社会活动辩证法、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新的实践观、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等几方面对邓小平同志“特色论”的哲学基础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 实事求是;辩证法;实践;人民群众

分类号 C01

0 引 言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入的是邓小平同志1982年至1992年期间的著作,这十年,是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最有成效的十年,也是理论上最具创造的十年,这期间,邓小平同志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也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坚持与发展.邓小平同志丰实的哲学思想不是以特定的范畴、规律、规则出现的逻辑化的哲学,而是表现为对哲学精神实质的深刻领悟,并能把它灵活地渗透于社会现实运动中,形成总体的、战略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它是从马克思理论体系生长出来的,并融化于当代中国实践活动中的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思想方式通过对各种具体问题的思考显示出来,并最终转化为中国人民的战略目标和实践活动.所以,没有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特色论”形成的哲学基础

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是毛泽东同志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所作的最简洁、最精确的概括.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廿多年的艰辛探索,找到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简朴易懂,但实行起来却十分不易,甚至毛泽东同志晚年也背离了这条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

收稿日期:1994-07-05.

孙方兰,女,1962年生,讲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总结的一个最根本的历史教训,就是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新时期历史的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及其建立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同志指出:“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2]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曾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当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后,无一例外地把经典上的社会主义当成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把所要实现的目标当成了起点。于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久,就试图从生产关系上向共产主义过渡,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情况,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完美,从而吃尽苦头。邓小平反对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始终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在创立的时候要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在实践中还要至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即从中国实际出发,“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可见,“特色论”的理论依据,始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但是邓小平同志作为理论家所具有的深厚功底和创造精神决不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简单重复上。关于实事求是,他的突出贡献有二点:一是把实事求是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精髓来认识,“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4]邓小平同志把实事求是当作马克思主义精髓,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实践产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特色论”的理论基石就是实事求是,正因立足于这条路线,才有了关于“中国特色”、“初级阶段”、“根本任务”、“市场经济”、“生产力标准”等一系列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突破。邓小平同志的另一贡献在于:丰富和深化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强调它们的一致性:“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5]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看成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6]在这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归宿,离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失去根基,而这样的解放思想只能是胡思乱想或痴心妄想;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必要条件,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换脑筋”,即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或改变旧的思维框架,使认识不断贴近现实。换言之,只有在解放思想过程中才能达到实事求是。“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7]

总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特色论”的精髓,“特色论”是“实事求是”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用与发展的必然结果。

2 辩证法在“特色论”形成中得到充分运用

邓小平同志被人们誉为辩证法大师,他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制定战略、方针和政策。他多次提出“要照辩证法办事”,但他又没有简单重复辩证法的一些基本概念,而是把辩证法的一般原理转化为一种方法论。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创造性地提出

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邓小平同志的贡献在于,他坚决贯彻毛泽东所倡导的这个根本的理论原则,并纠正毛泽东晚年对这个原则的偏离及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思想混乱,指出:“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9]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进一步说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从一定意义上说,“特色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完善,正是贯穿这个思想理论原则的结果,它一方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实现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等,另一方面又从我们的具体国情出发,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形式,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的所有制、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分配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既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又强调从中国特点出发,充分体现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

邓小平同志对辩证法的突出贡献还在于,他善于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运用“两手抓”的矛盾运筹辩证法及社会改革系统工程的辩证法,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为党和国家指明前进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正视我们社会出现的各种弊端,善于从社会基本矛盾的高度来进行分析,并找到了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例如,他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的现状,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0]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无论什么情况,都要抓住这个中心不动摇。他科学地分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主与法制、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矛盾两方面的关系,提出“两手抓”的方针,“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11]“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12]等等,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充满了对立统一思想。

为了发展生产力,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活力和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改革,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但要改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而且要改革交换关系,南巡讲话后,全党已取得共识,即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上层建筑的改革,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为了迅速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和各项事务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力,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组织上要大量培养使用“四化”干部,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邓小平同志更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此外,还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及其它文化体制改革的构想。总之,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实践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矛盾。

3 “特色论”是新时期实践的必然产物

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的理论观点的提出到其体系的形成,决不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

的,往往需要较长时期的实践磨炼才能形成,“特色论”也是如此。邓小平同志尊重实践,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国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是党进入新时期以后的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邓小平同志“特色论”的思想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即它的基本思想和一些基本的内容,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产生的,特别是对八大到十四大历史经验的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义建设即全面展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也就开始,从八大到十四大,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挫折的曲折的发展过程。两次胜利,即“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辉煌胜利;两次挫折,即“大跃进”和“文革”,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挫折,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这是“特色论”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特色论”大量的具体内容,则是在总结新时期十几年的实践中形成、发展充实、完善起来的。这一过程,也是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在文选中反映的十分充分。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没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①邓小平同志尊重群众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回答和解决了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并将它升华为理论。例如,工作重点转移后现代化建设分几步走,具体达到什么目标,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这些问题很自然摆在我们面前,需要给予回答,邓小平同志认真总结经验,提出了“翻两翻”、“小康社会”、“中国式现代化”、“分三步走”等完整的战略设想。再比如,粉碎“四人帮”后,针对长期热衷于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忽视经济建设的倾向,邓小平同志最早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针对人民公社的弊端,党中央及时肯定了安徽、四川农民的创举,在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农村改革取得成功后,又及时把改革由农村引向城市;当经济体制改革与上层建筑某些环节发生矛盾时,邓小平同志又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物质文明建设比较迅速,而精神文明建设有所忽略时,邓小平同志又及时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针对长期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后果,提出了对外开放政策;随着香港问题的到来,邓小平同志独创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当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面临计划和市场性质的争论时,邓小平同志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十四大又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凡此等等,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一步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是伟大的实践产生的伟大的理论。

邓小平同志的实践观,不仅表现在他尊重实践,还突出地表现在他进一步发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把它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随着实践的深入,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新的实践观,即把“三个是否有利于”作为判断大是大非的最根本标准。

邓小平同志不仅论述了发展生产力,搞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意义,而且还揭示了发展生产力的两条根本途径,即发展科学技术和改革开放。

总之,邓小平同志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进一步发展,体现出一种新型实践观。

4 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特色论”建立的必要前提

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思想是丰富的、深刻的,“特色论”的建立,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发展,也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发展和突破。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观点,一是社会生产观点,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二是群众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正确处理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在继承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课题,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

第一,拨乱反正,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这在前面有所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第二,防止腐败,加强群众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广泛深刻的人民性,这一理论之所以为亿万人民所拥护,是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特色论”的人民性主要表现在:

(1)这一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群众,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人民谋利益,是我党的宗旨,为了实现这个宗旨,共产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特色论反复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质上是强调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为了加强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克服以权谋私,不关心群众疾苦的腐败现象,要保持清正廉明,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等。

(2)这一理论是一部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建国大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关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蓝图设计,关于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等,无不是从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个宗旨出发的。

(3)这一理论总是把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政策的成败及变与不变的根本标准。邓小平同志判断改革的得失成败,考虑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变与不变,总是着眼于“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这种处处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思想的感情,充分反映了邓小平同志理论的人民性,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赞同。

总之,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④⑤⑥⑦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33、323、132、150、168 页

①②③⑨⑩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18、63、382、28、378、364 页